

自我“造血”：老工业基地改造亟待引入民间资本

过文俊

(湖北民营经济研究会, 湖北 武汉, 430064)

摘要: 曾经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前, 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位居全国前列, 为共和国的振兴和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入, 东北老工业基地老化和衰弱的征状日益突出。通过国家财政的反哺, 只能在短期缓解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中的矛盾, 惟有加快体制创新, 才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治本之策。在“国退民进”的改革中, 应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使民间资本成为制造业、科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等领域的生力军, 以此修复和增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自我造血功能。

关键词: 老工业基地改造; 民间资本; 体制创新; 自我造血

中图分类号: F224.0

文献标识码: A

“昔日参天蔽日的‘乔木’, 如今正在枯萎凋零”——这不是某位诗人笔下触景生情的伤感诗句, 而是人们对老工业基地衰落之忧患的真实写照。近年来, 我国老工业基地经济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为了让这些曾经支撑共和国经济大厦的栋梁坚固不朽, 中央政府已经把振兴老工业基地 (特别是东北老工业基地) 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温家宝总理在考察辽宁时指出,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 是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¹。改革开放以来, 中央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曾先后出台过包括建立经济特区和开发浦东在内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等重要国策,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一项新的国策, 能否将东北打造成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之后的中国内地经济“第四增长极”? 全世界都在翘首关注。

老工业基地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主要工业资源的集聚地, 老工业基地的成长与衰落并不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翻开世界工业发展的史卷, 我们可以看到, 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 大型工业基地先后在欧美国家崛起。英国的曼彻斯特、德国的鲁尔、美国的匹兹堡、俄国的乌拉尔等大型工业基地都曾聚集了巨大的工业力量和社会财富, 为本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我们也能发现, 这些工业基地也都先后经历了开发期——鼎盛期——衰退期——振兴期的演变过程。演变是由市场变化、资源枯竭、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等多种因素引起的。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改造, 是世界上发达国家都曾经经历过且目前仍在继续进行的重要课题。许多老工业基地通过技术改造、产业升级和改善生态环境, 已转化为新兴产业为主的工业基地。一些国家政府还设立专门的机构 (如法国政府的转型部、英国政府的煤炭调整部等), 专门从事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工作²。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完全可以利用后发效应, 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以较小的代价实现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振兴。就现实国情而言, 如何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民间资本日益壮大的新格局下实施振兴老工业基地的计划, 则是需要我们探索的新课题 (以下我们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主展开研究)。

1 老工业基地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困境

(1) 老工业基地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

我国老工业基地，主要是在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时期、19世纪末中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三线”建设时期等几个时期形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主要分布在沈阳和大连、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天津、武汉、重庆、太原等地。沈阳和大连老工业基地从19世纪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时期开始兴起，日本从满清政府手中夺取东北开发权后，就在沈阳、大连、抚顺、鞍山等地开矿建厂，试图把沈阳、大连变成其工业化和发动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南满”工业基地。上海老工业基地是我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发展起来的国际大都市。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特权，强迫在上海开埠建厂设店；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也在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崛起，形成了外国资本、买办资本、民族资本共存的、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天津老工业基地的情况与上海相类似。武汉老工业基地是从满清末期的洋务运动开始兴起的。当时在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张之洞的倡导与推动下，武汉建立了以炼铁、炼钢、枪炮制造为主的民族工业。重庆老工业基地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将上海、武汉等地的工厂迁往重庆，使重庆成为抗战时期的工业基地。太原老工业基地是在30年代山西军阀阎锡山统治时期兴起的，1936年太原就有了钢铁、机械、兵工、纺织等现代工业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开创了工业基地建设的新纪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以原苏联援建的156个重大项目为主，建设了哈尔滨、长春、成都、西安、兰州、洛阳等一批新工业基地。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重庆、大连、太原等原有工业基地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开始，按照毛泽东“备战”、“备荒”的战略思想，在西部地区8省1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将许多厂矿企业和科研院所从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地迁入西部地区，经过大约十年的大会战，建立起了一大批“三线企业”（从常规的民用工业到尖端的军事工业一应俱全）。建国以来，一大批工业基地的建设和成长，使我国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大大推进了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尽管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在工业基地建设中因不合理的布局、重复建设、重“重”轻“轻”等失误而交了不少“学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实施了沿海发展战略，经济建设重点转向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工业化进程，经过20年的建设和发展，一批新兴工业区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厦漳泉三角区等地迅速崛起。在这个过程中，老工业基地在能源、原材料、工业装备等方面给了沿海地区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一批接一批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涌向沿海（俗称“孔雀东南飞”现象），为新兴工业基地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源。如果没有老工业基地多方面的参与和支持，东部沿海地区很难在短短的20多年间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前列。

（2）老工业基地发展的现实困境

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老化衰弱的征状，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暴露出来，只不过在当时封闭自锁的环境下我们察觉不到或视而不见罢了。改革开放以来，老态龙钟的老工业基地经济衰退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与东部沿海新兴工业区生机勃勃的局面形成巨大的反差。据1979—1992年的统计，新兴工业区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GDP年均增长分别为13.26%、12.55%、11.2%、11.56%、10.61%；而老工业基地天津、辽宁、上海，仅分别为7.53%、8.12%、7.9%。总起来看，老工业基地GDP的增长速度大体低于新兴工业区23%—44%。东北地区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比较密集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矛盾尤为突出（以下我们主要以东北地区为例进行分析）。

曾经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并为共和国的振兴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一五”与“二五”期间，在国家156个重点建设工程中，东北地区就有56项，投资额占全部投资的37.3%。之后又陆续投资建成了以钢铁、原油、煤炭、电力、森工、重型机械、化工、机床、汽车、电站设备、造船、军工等部门等较为齐全的重工业基地。建国初期，东北老工业基地为全国提供的钢、平板玻璃和硫酸产量占全国的2/3，原油、

生铁、成品钢材、纯碱和烧碱产量占全国的 1/2，原煤为 1/3；改革开放初期，东北老工业基地为全国提供的原油、纯碱产量为 1/2，生铁、成品钢材产量为 1/4，钢、平板玻璃产量为 1/3，原煤、天然气、硫酸和烧碱产量为 1/6，汽车产量为 2/5；到 2000 年，东北三省的原油、天然气、生铁及钢材、汽车的年产量分别为全国的 43.3%、13.9%、13.5%、26.1%。随着计划的坚冰不断化解，市场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入，东北三省的工业发展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全国经济排名中不断后移，就 1990 年工业增长率来说，吉林省为全国倒数第 4 位，辽宁省为倒数第 5 位，黑龙江省更惨为倒数第 2 位。

2 振兴老工业基地不能单纯依赖国家财政的反哺

(1) 辩证看待国家对老工业基地的反哺

老工业基地曾为共和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它们因市场变化、资源枯竭、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出现衰退之势时，国家理应采取反哺政策帮助其摆脱困境，避免区域经济和社会状况恶性循环。在 2004 年“华交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公室主任张国宝表示，国家将给予东北 5 项新的财政政策：其一，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国务院批准豁免确实难以归还的历史欠税；其二，具备条件时，可以适当降低资源税税额标准；其三，按照增值税改革方向，允许东北地区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率先对新购进的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税金予以抵扣；其四，中央政府在安排一般性转移支付时，适当考虑对老工业基地支持；其五，对老工业基地企业工人工资的计税标准进行调整，减轻企业负担。另外，在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选择部分老工业基地城市进行分离企业办社会的改革试点，有步骤地剥离重点大企业办社会的职能，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所需费用由中央财政予以适当补助。

通过国家财政的反哺，从短期来看有利于缓解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中的矛盾，然而要实质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单纯依靠国家财政反哺，是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的。一是因为国家财力有限，在需要国家财政去解决的问题太多（如西部大开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的情况下，估计只能在豁免部分历史欠税和减轻目前纳税负担上做文章。二是因为老工业基地特别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比重大，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不彻底，法人治理结构很不完善，经济效益低下，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在这种状况下，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无异于向身患血癌的病人输血，注入再多的资金都难以填补预算软约束的“无底洞”。三是如果有限的国家财政资金只被动地发挥“救火”的作用，必然陷入“此处火刚灭，彼处又冒烟”境地。故国家财政资金只能用在“刀刃”上：如改善投资环境以引导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参与老工业基地改造、推动老工业基地的经济转型以增强其自我造血功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减轻“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压力等方面。四是税收政策历来只是一个调节工具，其自身并不能创造出市场化的机制。如果中央政府将增值税转型等在内的税收优惠政策当作振兴东北的重头戏，既无济于增强当地国有企业的自我造血功能，也不一定能够在吸引民间资本或外资上能产生持续的效应。

(2) 体制创新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治本之策

继 2003 年年底中央政府第一批 100 个国债资金项目投资（610 亿元）启动，目前“振兴东北”的期待似乎都聚焦在国家发改委的项目选择和资金投入上。2004 年伊始，东北三省许多地区的官员和国企负责人，可能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争取入选第二批、第三批国债资金项目上。但 2004 年中央政府显然放缓了后续投资项目筛选的进度。对此，有人提出了“振兴东北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质疑。但笔者认为，这一进度的推迟，体现了中央政府力求按科学的发展观办事的态度。因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固然缺钱，但最为短缺的要素是按市场规则配置资源的制度。如果没有公开、透明、统一的“游戏规则”，仍然按现有体制下官本位的“潜规则”来选项目、配资金，如此的振兴模式有“体制复归”之嫌。东北老工业基地集中了全国最大、最多、最基础的工业经济，它是中国计划经济最典型的代表。这一地区的国有企业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极深，它们仍然坚信“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削尖脑袋向政府伸手。如果不进行体制创新，政府一旦对其“断奶”，它们依旧不能自我发展，最终成为国家

越来越大的包袱。体制创新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治本之策，只有加快体制创新，才能摆脱过分依赖政府投入的局面，才能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造的潜力。

由于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比重大，且体制性矛盾没有解决，缺乏足够多的能为市场提供有效用商品或服务的微观主体。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甚至不具备真正独立法人地位，国有资产只有形式上的主人，而无人对其保值增值真正负责。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振兴老工业基地的着力点不是给国有企业大量输血，而是重塑其造血功能；不是再造几个大型国有企业，而是塑造一批在国际市场中有竞争力的混合所有制性质的超大型企业集团。也就是说，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关键是进行经济体制创新，在这种体制创新过程中，应通过广泛引入民间资本，促进现有的国企明晰产权关系，使之成为真正按市场规律办事、以争取最大限度利润为目标的法人，从而改善自我造血功能来实现其持续发展。针对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强调“招大商，招外商”，看不起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的错误观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把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的力量聚集起来，完全能够承接国有企业退出后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重任，完全可以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进行二次创业。当然，我们并不是反对扩大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而是主张在政策上对内资和外资应一视同仁，均享“国民待遇”（更为详细的观点参见本书第四章）。事实上，民营企业熟悉本土文化、在与国有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学会了一些防范非市场性风险的经验、能够比较务实地处理历史债务包袱和人员安置等疑难问题。而外资企业因普遍害怕国有企业按不透明、不公开的“潜规则”行事（这种现象东北比沿海地区严重得多），与国有企业的文化冲突较大，且按国际惯例处理公司兼并、重组事务，往往不能解决人员安置等相关的社会问题。故在同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进行兼并、重组的谈判方面，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恋爱”的成功率，一般比外资企业要高；而扯皮和“离婚”率，则比外资企业要低⁴。因此，在现实情况下，民间资本更有条件成为参与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改造的主力军。

3 如何利用民间资本振兴老工业基地？

国有经济比重高是老工业基地难以走出困境的最突出问题。据统计，截止 2002 年底，在全部工业增加值中，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64.5%、78%和 88%，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1.5、25 和 35 个百分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占比远高于其他地区，而国有大企业改革因涉及巨额历史包袱（主要是高额负债、冗员和企业办社会等三大负担）的处理及复杂的社会问题而难以推进。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平均在 90%左右（仅黑龙江省的国有企业，目前的历史挂帐就有 100 亿元以上）。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有 400 多万人，占全国下岗职工总数的近 1/3。多数国有企业办社会的支出，几乎相当于企业的净利润。虽然东北老工业基地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行动早在 1997 年就开始进行，到 2002 年约有一半的国有企业退出了一般竞争性领域，但已经完成改制的主要是中小型国有企业。以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黑龙江省为例，2002 年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工业资产、销售收入、增加值仍占全省规模以上企业总额的 80%左右，利税则占全省规模以上企业总额的 90%左右。2003 年，全省工业中民营企业工业总产值只有 106 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 4.2%，比全国民营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1.7%）低 7.5 个百分点⁵。

东北老工业基地长期受传统体制的束缚，无论是生产经营，还是社会资源的配置，市场化程度都较低，难以将本地和外地（国）的民间资本吸引过来。由于国有企业自我发展和自我改造能力较弱，民营企业的比重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致使东北老工业基地扩大再生产的整体投入严重不足。据统计，2002 年东北三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2916 亿元，还不及广东一省的投资规模。因此，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在“国退民进”的改革中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通过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造来修复老工业基地自我造血的功能。具体来说，利用民间资本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1）鼓励民间资本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制造业的主力军

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过去的主要优势在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传统制造业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该区域经济的主体部分和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从实际情况出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仍需把加强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当然，加入 WTO 后，东北老工业基地传统的制造业既面临着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技术升级的挑战，也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与我国大致相当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改革开放后，虽然国家集中力量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但仍然在“八五”计划前后选择沈阳、哈尔滨等地给予了技术改造方面的资金扶持。以沈阳为例，1980 年至 1998 年，累计完成技术改造投资 359 亿元。技改投资的 70% 放在机械、医药、化工、电子等支柱产业、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上，使沈阳机床行业的技术装备、主导产品、组织模式水平均居全国领先地位，数控机床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20%，普通机床、摇臂钻床达到 25% 和 70%。与此同时，还开发出了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配套的大容量高压输变电设备、大型露天矿连续开采设备、大型合成氨成套设备、乙烯工程配套设备等一批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重点发展了汽车、环保、电子等新产业。但从总体上看，东北老工业基地制造业技术改造的资金依然十分短缺。因此，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应该让民营经济在一般竞争性的制造业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以此弥补发展新兴制造业和帮助传统制造业进行技术升级的资金短缺，尽快提高东北老工业基地制造业在全国和国际市场的整体竞争力。

在市场供求格局、经济体制环境和对外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制造业企业如不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去开发新产品，市场竞争力必然会下降。过去民营企业的技术与产品档次一般比国有企业还低，因此，民营经济参与老工业基地国有制造业企业的改造，应迅速补齐自己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短板”，以经济全球化的战略眼光跟踪国际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动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寻找有市场潜力且自己能够充分驾驭的领域有序地进入。近年来中国加工工业突飞猛进，但制造业设备却大量依赖进口（如 2002 年，绍兴地区纺织行业的民间企业一次就进口了 200 亿元人民币的纺织机械），民间资本进入老工业基地制造业后，完全可以捕捉类似的市场机会，在制造业领域大显身手。当然，民营企业进入制造业改造国有企业或进行新的投资，必须量力而行。单体资本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毕竟微乎其微，类似“铁本事件”这样超越自我能力上规模的教训，也应该引起民营企业深思。

（2）鼓励民间资本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科技产业的生力军

目前，在高科技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前沿领域（包括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项目），国有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仍然发挥着主体作用。而在信息网络产品开发、应用软件、生物制药、新材料应用等大量分散的高新技术应用开发领域，民营科技企业则具有现实或潜在的优势。而且在许多高科技领域，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已经相互交错、渗透。例如民营企业沈阳的东大阿尔派公司，以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软件，采用“虚拟生产中心”的形式生产医院用的 CT 机。东大阿尔派公司上市后，又与上海宝钢等企业合作，组成新的股份制企业。我们认为，只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在类似东大阿尔派这样的科技型民营企业领头羊的带领下，完全有可能在东北地区构建若干电子软件、信息服务、生物技术、新材料等产业基地，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打造出一批新的支柱产业，使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不断随科技进步而自我完善。

笔者认为，民间资本参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科技产业的投资，应特别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在吃透国家产业政策的基础上顺势而为，以便获得国家创新基金的资助和其他优惠政策的扶持；第二，辩证看待科技项目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既要追踪世界高新科技前沿，更要注重非专利、非高新科技等应用技术的创新，把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新产品的创富能力作为现实目标⁶；第三，积极与国有科研机构和国有科技型企业开展分工协作，充分利用对方一切可以利用的科技资源，降低民营企业科技开发和应用的成本；第四，随着企业的发展适当增加科技开发投入的比重；第五，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两种途径形成强有力的科技创新团队，并通过期权等激励机制调动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3)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东北老工业基地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经营

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基础设施的欠帐很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1990 年代以来，该区域不少城市围绕旧城改造、建设现代化都市的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了城市的综合功能。由于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且这些领域的项目投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大、投资回收期比较长甚至难以回收投资，民间资本无论从投资动机还是从投资能力上看，都不适宜在这方面占主导地位。因此，对于基础建设领域中涉及公共产品及自然垄断性质的基础领域，仍需由政府作为投资和供给的主体，以履行其公共财政职能。而在非公共性及具有一般竞争性基础领域，民间资本则可大展身手，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具体来说，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管线、城市道路、城市生态环境、公共信息网络等投资，不可回收的非经营性公共设施项目等，应主要纳入政府投资的范围；而对于自来水、污水处理、供气、供热、收费道桥、公共交通等经营性或有盈利潜力的项目，则应更多地交由民间资本去投资和经营（这类项目投资规模和投资回收期比较适中、收益比较有保障，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和经营这类项目，可以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过去普遍比较封闭，随着对内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这些城市将逐渐改变其单一工业生产中心的格局，由封闭的行政中心转变为区域经济中心，增强其对周边地区经济的辐射力和吸引力。按照这种城市规划的新思路，东北老工业基地各城市之间，应该大力发展跨地域的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通信网络、物流体系等基础设施。民间投资本身没有多少地域限制，因而在这些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应该争取分得更大的“蛋糕”。

(4) 鼓励民间资本进一步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第三产业

根据国际经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在 GDP 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在两者的相互协调中变化，当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大超过二、三产业时，整个经济才能达到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境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特别是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在工业化过程中不太重视甚至忽视这一规律，第二产业往往孤军突进，缺乏第三产业的支撑与配合，使第二产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都受到牵制。

加入 WTO 之后，我国第三产业的所有领域将逐步对外资和民间资本开放。除了在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社区服务、非义务教育、非基本医疗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外，民间资本将可随着有关行业市场准入限制减少和取消，参与中小型金融机构、图书出版、广播电视、铁路和航空支线等领域的投资。据悉，万向集团、华西集团、红豆集团、北京恒基伟业等 10 家民营企业拟联手日本、美国等跨国银行，共同投资 10 亿元成立股份制的民营“东北发展银行”。

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和技术改造，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两项基本任务，两者都必然导致国有企业大量裁员。东北老工业基地需要安置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之社会负担本来就十分沉重，在进一步实施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后，怎样处理和消化相应的社会矛盾？解决这些问题自然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而鼓励民间资本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也不失为大规模吸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一条有效途径（例如东三省中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大连市，近年来下岗职工有 80% 在民营企业实现了再就业，而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数是第三产业性质的企业）。

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长期以来都是按照“大而全”或“小而全”的模式经营，承担了许多本来应当由政府和社会承担的后勤服务业和其他社会事业（这些事业基本上都是第三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黑龙江省的国有企业每年仍有 120 亿元“企业办社会”的开支。不卸掉这些负担，国有企业无法轻装前进和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进一步剥离非经营性资产和社会性事业，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这种剥离过程中，民间资本通过承接部分剥离出来的有效资产和员工，可以寻找到许多有利的投资机会。

Self-" Hematopoiesis ": Reconstructing The Old Industry Base Need to Import The Nongovernmental Capital

Guo Wen-jun

(Hubei economic research of run by private capital meeting, Wuhan 430064, China)

Abstract: Before 80's in last century, the old industry base of the northeast, as "the republic eldest son", is always the national fore type and dose the huge contribution for the republic. Along with continuously thorough reform of the market mindset, the old industry base of northeast is aging. The nation public finance only can in short date alleviate antinomy of the old industry base economy development. However speeding the system innovation can solve it. In the reform of "the country backs and the people enters", we should construct the goo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make the nongovernmental capital become reascent force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third industry, repair and strengthen the self-hematopoiesis of the old industry base of northeast.

Key words: reconstructing the old industry base; the nongovernmental capital; system innovation; self-hematopoiesis

收稿日期: 2004-8-10

作者简介: 过文俊, 湖北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通信地址: (430064) 武汉市武珞路 114 号 29 号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¹ 据东北新闻网 2004 年 7 月 16 日消息。

² 林凌、刘世庆: 《加快我国老工业基地调整与改革步伐的研究报告》, 四川社会科学网 2002 年 9 月 26 日。

³ 林凌、刘世庆: 《加快我国老工业基地调整与改革步伐的研究报告》, 四川社会科学网 2002 年 9 月 26 日。

⁴ 据统计, 近 5 年来, 东北某省中止和撤销的外商投资企业多达 3000 多户, 同期新批外商企业仅 2000 多户。2001 年, 东北三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 31.95 亿美元, 仅占全国的 6.43%, 相当于华东地区的 1/7、广东省的 1/4。参见《财政救急救不了穷 振兴东北方式要变》(东北新闻网 2004 年 7 月 24 日)。

⁵ 参见《东北振兴的十个突破口》, 东北新闻网 2004 年 7 月 17 日。

⁶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认为, 创新不一定非要以高科技作为基础。以技术创新著称的日本索尼和韩国三星, 所推出索尼“随身听”和三星手机都没有什么独创技术, 而主要是在应用技术上有所创新。这些企业占领市场的关键并不是因为其科学技术水准比其它企业高很多, 而在于他们对市场需求理解和研究的水准高于其它同类企业, 在于他们能根据市场需求迅速进行实用技术的创新。